

#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 结构特征模型

社会  
2012·3  
CJS  
第32卷

张 顺 郭小弦

**摘 要:**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关键词:**求职过程 地位获得 结构模型 社会转型

## A Micro-Analysis of the Job-Search Process: A Structural Property Model

*Zhang Shun Guo Xiaoxian*

**Abstract:** Job-search proces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re crucial aspects of labor market research and have long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from both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Since 1960s, research in both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has addressed these issu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which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status-attainment model,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are important parts. This paper puts the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job-search proces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

\* 作者1:张 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Author 1: Zhang Sh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作者2:郭小弦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Author 2: Guo Xiaoxi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E-mail: xjtu.guo@gmail.com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八城市求职网调查,关于调查及抽样的具体说明,参见本期发表的边燕杰等撰写的一文。

Based on the classic theories, the study is abo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ing forces for attaining individu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es. This paper has three main objectives: 1) to differentially treat attaining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statu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mechanisms; 2) to apply the classic theories to the micro-process of job search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d explain the variability in status attainment outcomes with the structural property indices at the point of hiring so that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more convincing; and 3) to construct a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for the job-searching process in an institutionally segmented labor market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main findings show that once structural property variables are held constant, the educational rate of return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structural factors in status attainment. Ascribed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es in contrast to achieved factors. In an institutionally segmented labor market, ascribed and achieved factor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ir impact on job-search outcomes.

**Keywords:** job-search process, status attainment, structural model, social transformation

---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本文的出发点是: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用求职者入职时的结构特征指标来解释其结果的差异性,从而增加实证结果的说服力;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建构了体制分割下求职过程的地位获得模型。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视角不同,因而两者关注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

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造成经济收入差异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之外,可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是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原则,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多寡成为是否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则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另外,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经济学偏重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则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本文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是否相同,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

## 二、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

舒尔茨(Schultz,1963)基于对二战后德、日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考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一年后,贝克尔(Becker,1964)从微观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自于求职者人力资本的多寡,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其边际产值。当一个求职者拥有越高的人力资本,他就拥有越高的生产能力,相对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和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主要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指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能力和潜能就越高;二是工作经验,指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验越长,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相应技能和知识就越高;三是在职培训,尤其存在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如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

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Schultz,1963)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Spence,1974)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力的外在信号,并不能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从中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等,2008:27)。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 education)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数量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贝克尔(Becker,1964)证明了均衡教育回报率的存在;明瑟(Mincer,1974)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等三个模型。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7%。但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被低估,因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必然导致其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在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10.7%;在扩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2.5%。

本文采用明瑟(Mincer,1974)的三个实证模型来测算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中的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指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年龄-受教育年限-6年<sup>1</sup>;因变量为入职收入,即进入当前工作时的收入。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

---

1. 工作经验的计算方法:假定劳动者是6岁起开始接受正式教育,6年为接受教育前的年龄。

也带来了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sup>1</sup>,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的物价指数,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100,则1979年的物价指数=(1979年物价水平÷1978年物价水平)×100。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笔者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即实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该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表1:人力资本模型的变量描述统计 (N=5 67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对数	4.844	1.325	0.693	9.393
教育年限	12.611	3.235	3	19
工作经验	8.470	9.170	0	58

表2的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5.8%,由于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呈负相关,使得标准模型中的教育回报率为21.3%,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12.5%。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他学者的估计结果(李春玲,2003a;刘精明,2006)。

表2:求职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模型 (N=5 672)

	基准模型	标准模型	扩展模型
教育年限	0.158***	0.213***	0.125**
工作经验		0.0670***	0.175***
工作经验平方		-0.001***	-0.002***
教育年限平方			0.006***
教育年限*工作经验			-0.006***
截距项	2.848***	1.710***	1.611***
拟合优度	0.149	0.224	0.253
BIC值	18 390.4	17 883.4	17 684.5

注: \* p<0.05, \*\* p<0.01, \*\*\* p<0.001。

1. 参见:《长春市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济南市统计年鉴》、《兰州市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厦门市统计年鉴》和《西安市统计年鉴》。

### 三、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

#### (一) 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又将两者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 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注重比较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up>1</sup>作为因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赋性因素,以本人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和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因素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因素的影响强度较高。

后继学者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介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Swell, *et al.*, 1969);为了说明当时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在模型中剔去了初职变量,增加本人幼年和成年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量,以及收入变量(Jencks, *et al.*, 1988)。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工业化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特质的影响,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对社会地位的影响(Treiman, 1970),如布迪厄(Bourdieu, 1986)加入了文化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的再生产功能。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属林南和边燕杰(Lin & Bian, 1991)的“单位地位模型”,该模型改造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

---

1. 邓肯(Duncan, 1961)设计了测算方法来估计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即在职业声望测量获得的有限的职业声望得分的基础上,加上了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回归方程,计算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随后通过回归方程估计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 即 SEI)。

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1993;李汉林、李路路,1999)。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Lin & Bian, 1991)。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政治身份,即党员身份的测量。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变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见,地位获得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二是在实证方面,不太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 (二) 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位更多受其所在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差异性。

在变量测量上,用入职时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sup>1</sup>。在自变量中,除个人教育水平外,增加个人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

---

1. 使用单位声望作为中国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改进测量,参见: Nan Lin & Yanjie Bian (1991)。文中论证了中国社会单位制的深入影响,以及单位声望较职业声望更符合中国社会个体社会地位测量的代表性。他们发现,较之职业地位的差异,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的占有主要通过所在单位完成,即为“单位地位模型”。另外,使用劳动者入职时所进入工作单位的单位性质对入职声望进行赋值。

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另外,选取了工作单位性质、婚姻状况、入职年龄段、性别、职业流动状况、入职年代和地区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纳入模型中,各项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地位获得模型的变量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入职单位声望	6 410	47.659	17.205	24	86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	6 618	0.099	0.299	0	1
工作经验	5 900	8.623	9.246	0	58
父亲教育年限	5 590	8.746	4.102	3	19
父亲单位声望	4 518	47.835	18.209	24	86
单位性质(体制内=1)	6 410	0.677	0.468	0	1
职业流动(流动过=1)	6 605	0.442	0.497	0	1
性别(男性=1)	6 617	0.461	0.499	0	1
婚姻状况(已婚=1)	6 613	0.832	0.373	0	1
入职年龄段					
18—29	4 426	69.49			
30—45	1 643	25.80			
46—69	300	4.71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592	8.95			
本地非农户口	5 442	82.24			
外地非农户口	583	8.81			
入职年代					
1956—1979	1 627	24.9			
1980—1992	1 446	22.13			
1993—2001	961	14.71			
2002—2009	2 501	38.27			
地区					
长春	643	9.72			
广州	966	14.60			
济南	657	9.93			
兰州	919	13.89			
上海	906	13.69			
天津	957	14.46			
厦门	662	10.00			
西安	908	13.72			

从表 4 的结果可见,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 6.6%,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相比,几乎下降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刘精明,2000;李春玲,2003b)。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其次,个人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

表 4: 求职过程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地位模型 (入职单位声望)	经济地位模型 (入职收入)
教育程度	1.596***	0.066***
政治面貌(参照项:非党员)	4.511***	0.230***
工作经验	0.204*	0.007
父亲教育程度	0.158*	0.017***
父亲单位声望	0.111***	-0.001
单位性质(参照项:体制外)	10.19***	-0.264***
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0.389	0.359***
性别(参照项:女)	-1.129*	0.119***
年龄(参照项:18-29)		
30-45	-1.143	-0.112
46以上	-3.857	-0.519***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2.222**	0.010
户口状况(参照项:农业户口)		
本地非农户口	2.378	0.035
外地非农户口	0.063	0.108
入职年代(参照项:1956-1979)		
1980-1992	0.790	0.340***
1993-2001	4.422***	1.195***
2002-2009	4.725***	1.771***
地区(参照项:上海)		
长春	-2.169*	-0.446***
广州	0.500	-0.265***
济南	-2.351*	-0.559***
兰州	-1.458	-0.487***
天津	-1.801*	-0.231***
厦门	2.227	0.253***
西安	-4.750***	-0.568***
截距项	7.986***	3.067***
样本量	3 817	3 703
拟合优度	0.201	0.629

注:1. 社会地位获得模型采用 OLS 估计,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对收入取对数后进行 OLS 估计。

2.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影响,但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表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社会地位高往往与父亲单位的性质紧密联系,这种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和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均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其社会地位,即进入体制内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较高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曾经的职业流动对

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社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过工作的人的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要高,而在职业地位上两者没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本人教育程度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升大约1.6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0.16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收入上升6.6%,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收入上升大约1.7%。可见,相比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了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的收入普遍高于女性的收入,而男性的单位声望却普遍低于女性的单位声望;相对于年轻者,年龄大的求职者进入工作时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而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社会地位较高。

##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却不尽人意。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的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llace & Althouser, 1981)。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是从个体角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结构分割因素。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分割的原因是由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引发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

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于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分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 Kalleburg(1981)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极大地制约着微观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organizational dualism),企业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的压力,劳动力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机会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industry segmentation)的视角不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 (二) 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分割或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由于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等的制度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并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济回报和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分割的封闭程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的过程与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实质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

精明,2006);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2007)。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展到全社会(边燕杰等,2006)。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

### (三) 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本研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来分析体制分割。从横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1992年之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和1993年之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的性质和入职时间,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和差异性。

在表5经济地位获得模型的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1.4%),在体制外无影响;父亲社会地位在体制内外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6.3%与6.4%,内外持平。政治面貌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这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份,两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社会地位和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几乎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社会地位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即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比较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可以发现,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表明,社会

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依然存在。

表 5:横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的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地位模型(入职单位声望)		经济地位模型(入职收入)	
	体制内	体制外	体制内	体制外
教育程度	1.874***	0.842***	0.0634***	0.0640***
政治面貌(参照项:非党员)	4.517***	1.373	0.210***	0.236**
工作经验	0.254*	0.035	0.011	-0.006
父亲教育程度	0.142	0.192	0.020***	0.011
父亲单位声望	0.157***	0.004	-0.001	0.002
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0.636	-2.986***	0.345***	0.372***
性别(参照项:女)	-1.739**	0.541	0.091**	0.186***
年龄(参照项:18-29)				
30-45	-1.295	-0.835	-0.112	-0.068
46以上	-3.081	-3.290	-0.643***	-0.220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5.104***	1.292	-0.068	0.124*
户口状况(参照项:农业户口)				
本地非农户口	4.282	2.647*	0.051	-0.013
外地非农户口	2.172	1.033	0.177	0.053
入职时代(参照项:1956-1979)				
1980-1992	-0.482	1.230	0.305***	0.708**
1993-2001	1.977	2.584	1.115***	1.262***
2002-2009	5.073***	0.879	1.837***	1.681***
地区(参照项:上海)				
长春	1.901	-10.93***	-0.380***	-0.578***
广州	2.809*	-4.155***	-0.110	-0.539***
济南	-0.189	-7.210***	-0.390***	-0.962***
兰州	1.047	-7.712***	-0.373***	-0.724***
天津	-1.229	-1.778	-0.179**	-0.305***
厦门	5.792***	-4.192**	0.173	0.198*
西安	-2.827*	-8.868***	-0.456***	-0.790***
截距项	6.519	33.12***	2.811***	3.275***
样本量	2 564	1 253	2 525	1 178
拟合优度	0.215	0.156	0.570	0.374

注:1. 社会地位获得模型采用 OLS 估计,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对收入取对数后进行 OLS 估计。

2.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3. “市场化程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加入不同城市作为控制变量旨在控制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先后差异。同时,我们使用改革前和改革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来展现不同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

表 6:纵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地位模型(入职单位声望)		经济地位模型(入职收入)	
	再分配主导	市场主导	再分配主导	市场主导
教育程度	1.962***	1.158***	0.068***	0.092***
政治面貌(参照项:非党员)	0.537	6.283***	-0.106	0.253***
工作经验	0.114	0.198	0.025**	0.007
父亲教育程度	0.095	0.178	0.019***	0.021***
父亲单位声望	0.187***	0.061**	-0.002	-0.001
单位性质(参照项:体制外)	4.089*	11.040***	-0.767***	-0.317***
职业流动(参照项:未流动)	1.219	-1.541	0.488***	0.349***
性别(参照项:女)	-0.685	-1.470*	0.071	0.172***
年龄(参照项:18-29)				
30-45	1.191	-2.123	-0.038	-0.145
46 以上	-0.796	-5.238	0.208	-0.415**
婚姻状况(参照项:未婚)	1.263	2.356**	0.082	-0.129**
户口状况(参照项:农业户口)				
本地非农户口	1.062	3.119*	-0.075	-0.091
外地非农户口	3.380	0.411	-0.042	0.058
地区(参照项:上海)				
长春	1.236	-5.711***	-0.283***	-0.528***
广州	1.762	-0.539	0.048	-0.481***
济南	-2.442	-2.946*	-0.285***	-0.746***
兰州	-0.320	-2.994*	-0.147	-0.663***
天津	-1.999	-0.906	-0.091	-0.264***
厦门	6.001*	0.354	0.242	0.113
西安	-3.015*	-6.323***	-0.272***	-0.767***
截距项	7.797	22.05***	3.488***	4.614***
样本量	1 650	2 167	1 620	2 083
拟合优度	0.191	0.235	0.202	0.289

注:1. 社会地位获得模型采用 OLS 估计,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对收入取对数后进行 OLS 估计。

2.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表 6 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在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而父亲社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自致性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 1 年则收入分别增加 6.8%与 9.2%。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比非党员的入职收入高出 2.5%,但在再分配时期却没有影

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份的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多1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2.5%,但在市场主导期对收入无影响。这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凸现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或产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能得到更高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异更多表现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进一步比较发现,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且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其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对入职地位的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对于政治面貌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均有更高的回报,表明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

##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研究的发现有三点。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

第二,求职过程双重地位获得模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先赋性因

素更多影响社会地位获得,自致性因素则更多影响经济地位获得,其中教育水平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都受体制分割的影响。相对于体制外劳动市场而言,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对地位获得产生更强的影响;与此同时,相对于市场主导时期,教育程度在再分配主导时期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强。党员身份在市场主导时期及体制外市场更有收入优势;工作经验仅在体制内的劳动力市场中为求职者带来更多的入职收入。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Becker, Gary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边燕杰、李路路,等. 2006. 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J]. 中国社会科学(5). [Bian Yanjie, Li Lulu, et al. 2006. "Structural Barriers,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ource Differentials: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Repor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in Chinese)]
- 边燕杰,等. 2008. 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ian Yanjie, et al. 200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The Overseas Scholar's Advanced Research on Chin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Blau an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 郝大海、李路路. 2006. 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 2003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J]. 中国社会科学(2). [Hao Dahai and Li Lulu. 2006. "State Monopol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egional Disparity Reform: Based o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ata 2003."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in Chinese)]
- Jencks, Christopher, Lauri Perman, and Lee Rainwater. 1988. "What is a Good Job? A New Measure of Labor-Market Suc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 李春玲. 2003a. 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察[J]. 社会学资料(3). [Li Chunling. 2003 "How does Education Give Impact on People's Economic Income; A Study on the Rate of Educational Return." *Sociology Studies*(3). (in Chinese)]
- 李春玲. 2003b.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 中国社会科学(3). [Li Chunling. 2003.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and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1940—2001)."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in Chinese)]
- 李汉林. 1993. 社会单位现象和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J]. 社会学研究(5). [Li Hanlin. 1993. "Danwei Phenomenon and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Sociology Studies* (5). (in Chinese)]

- 李汉林、李路路. 1999. 资源与交换: 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结构[J]. 社会学研究(4). [Li Hanlin and Li Lulu. 1999. "Resource and Exchange; The Dependence Structure of Chinese *Danwei* Organization." *Sociology Studies* (4). (in Chinese)]
- 李强、刘精明. 2000. 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号). [Li Qiang and Liu Jingming. 2000. "The Ascribed and Achieved Factor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Quarterly* (Summer Issue). (in Chinese)]
- 刘精明. 2006. 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J]. 中国社会科学(5). [Liu Jingming. 2006. "Marketization and State Regu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5). (in Chinese)]
- Lin, Nan and Bian, Yanjie.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 Mincer, Jacob.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Human Behavior & Social Institutions* (2).
- Schultz, Theodore. 1963.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 Michael. 1974. *Market Signaling: Informational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Screening Proces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well, William H., Archibald O. Hailler, and Alejandro Portes. 1969.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 Treiman, Donald.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ited by Edward O. Lauman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Wallace, Michael and Arne Kalleberg. 1981.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Firms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Toward a Specification of Dual Economy Theory."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abor Marke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张丽娟. 2007. 转轨阶段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收入分配[G]//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李路路、边燕杰, 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ang Lijuan. 2007. "The Ownership Segment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bor Market under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ransition Society." In *Institution Transi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edited by Li Lulu and Bian Yanji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李 聆